

榆林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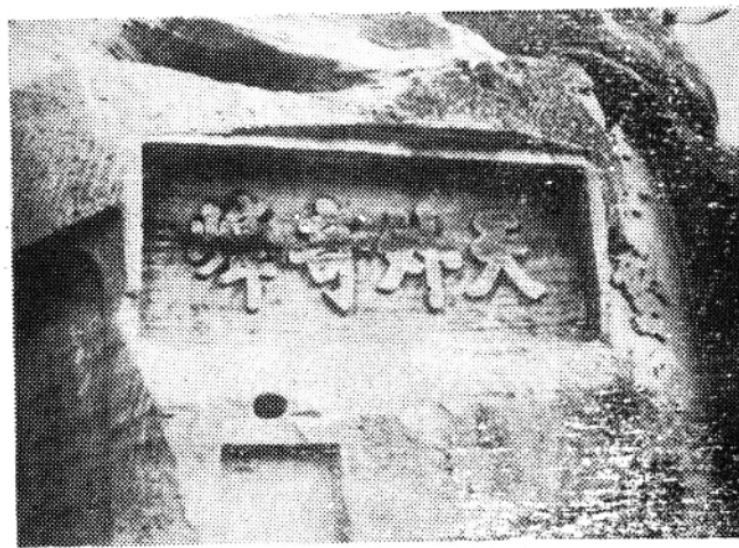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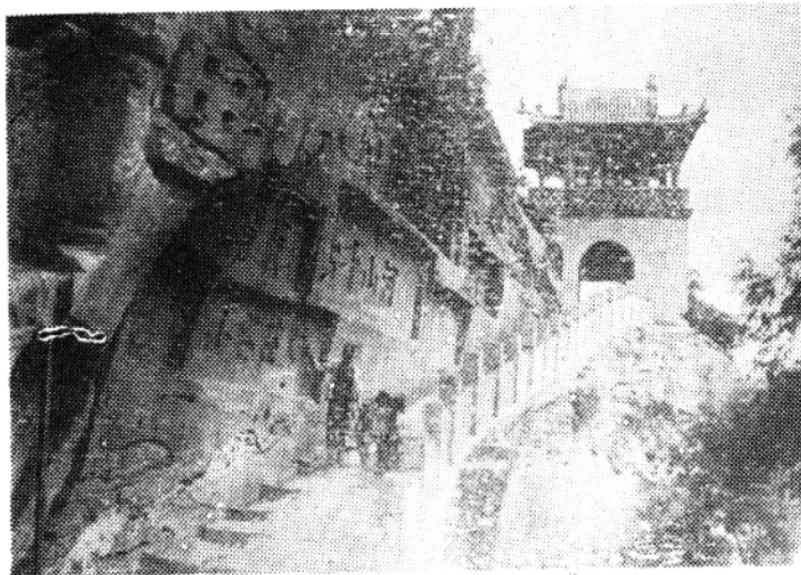
(第十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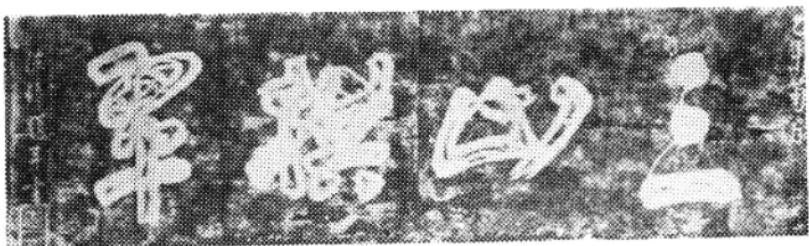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榆林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

榆林红石峡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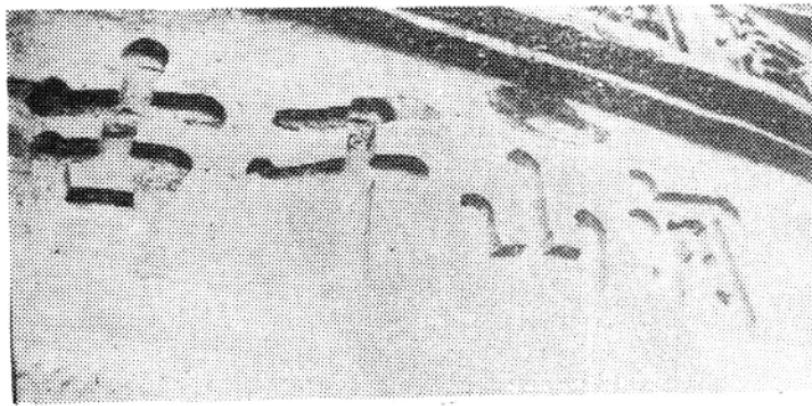
“天外奇峰”



“三山拱翠”



“威镇九边”



“河山千古”



张季鸾先生遗像

紀念愛國報人 張季鸞先生

居 武



紀念愛國報人張季鸞先生

編 者 按

1991年9月6日是愛國報人張季鸞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日，政協榆林市委員會于9月2日至6日舉行了“紀念張季鸞先生逝世50周年大會”和“張季鸞學術研討會”，并出版了《張季鸞先生紀念文集》。最近我們又收到幾篇論文和懷念文章，特選登發表，以飨讀者。

目 录

《纪念张季鸾先生逝世 50 周年》

- 张季鸾先生生平简介 李云祯 牛济 刘耿 (1)
张季鸾先生的新闻事业观 张士基 (6)
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怀念张季鸾先生 王文彬 (16)
周恩来与张季鸾及《大公报》 牛 济 (22)
纪念舅父张季鸾先生 李赋英 (28)
怀念老前辈张季鸾先生 叶遇春 (32)
永生的报人模范 张根生 (13)
冬夜梦张季鸾 王军余 (34)
香港《大公报》李侠文、杨奇、马廷栋贺电 (27)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副会长宁树蕃、陈业劭
贺电 (27)
胡星元先生贺信
缅怀爱国政论家张季鸾先生 (35)
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张岂之祝词 (36)

《庆祝胡星元先生寿辰》

- 李锦升、杨树德、杨颖德、白福江给胡星元先生祝寿
电 (37)

祝寿词	李云祯	(38)
千秋岁引(祝星元老人八秩九寿)	郭冠英	(39)
胡星元先生八十九寿辰祝辞		
	中国民主促进会榆林市支部	(40)

{人 物 春 秋}

缅怀李赋丰同志	孙克绍 阎新民	(41)
刚直不阿的官吏——胡毓撰	胡启文 李 霖	(46)
缅怀名老中医张鹏举	刘 哲	(49)
体坛名萃——郭季宁	李祖德	(55)
榆林地区历史名人歌	崔月德	(57)

{委 员 风 采}

不待扬鞭自奋蹄

——记榆林市政协委员罗生琪	陈王兴	(63)
一个普通农民的心愿		
——记市政协委员杜玉山的事迹	焦耀平	(66)
以农为本发家致富的马俊成委员	高治峰	(70)

{史 事 纵 横}

榆林人口的历史变迁	赵 江	(73)
-----------	-----	------

民国年间税收制度 李德庵 (81)

《亲历 亲闻 亲见》

毛泽东在榆林地区的伟大活动 张承有 (86)
记抗日时期移送成吉思汗灵榇一事 张紫垣 (91)

《爱我名城》

今日榆林 王文彬 (95)
榆林绿化诗话 李德忠 (100)
长城姑娘治沙连 边兆芳 (103)

《艺文掇拾》

辛亥革命起义歌 张星炳搜集整理 (106)

《文物考古》

塞上瑰宝——红石峡摩崖石刻 贺菊芳 (109)
榆林出土的墓志铭 张钟权 (118)

《文化源流》

榆林方言 武国雄 (121)

补白

司马光缘何推荐刘器之	(5)
居则视其所亲	(48)
进贤为贤	(54)
玉蝴蝶(词)	(56)
中国古典名著外国译名	(65)
哭母不衰	(69)
景公居严	(72)
买鳖亡鳖	(80)
毛泽东思想何时提出	(90)
佛受贿乎	(94)
善战者省敌	(108)
谄事者戒	(120)

封二 榆林红石峡摩崖石刻：红石峡一角

封三 红石峡石刻：“三山拱翠”“天外奇峰”

“威镇九边”“河山千古”

张季鸾先生生平简介

李云桢 牛济 刘耿

张季鸾（1888—1941年），名炽章，陕西榆林市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国际知名的一代报人。他与于右任、李仪祉被誉为“陕西三杰”。先生淡泊名利，言论报国。从事新闻事业垂30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达15年，“积30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于右任语）。抗日战争时，先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历届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毛泽东语）。他的一生，如周恩来所言“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先生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字翹轩，清光绪三年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终身儒素，不苟取与，与人厚，自治严，工文辞书法，未尝自诩。教子孙专志经史，勿循举业”。1901年初，张父病歿于济南，他随母王氏，千里迢迢扶柩回籍。幼年在榆阳书院从硕儒田善堂先生就读，秉性聪颖，勤奋好学，擅长撰文，以“神童”著称。1902年秋，得延榆绥道陈兆璜资助前往礼泉烟霞草堂，从师关中经学领袖刘光瀛（字古愚）。1903年春，转入三原宏道学堂。1904年初，母王氏病逝。他回榆林料理丧事，强

忍悲恸之情，继续刻苦求学。1905年，年仅18岁的张季鸾，以优异成绩入选官费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转入一高）。不久，由同乡康心孚介绍，谒见孙中山先生，立即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协助并勿幕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2月，编辑革命刊物《夏声》。配合国内反清斗争，推动陕西民主运动。1908年夏，回乡祭祖、完婚，应邀在榆林中学讲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创办《陕北》杂志，从此踏上言论报国的道路，开始新闻职业生涯。

辛亥革命前夕，为早日推翻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先生毅然归国，同于右任编辑《民立报》，使《民立报》成为同盟会在上海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和秘密联络据点。武昌起义后，先生积极参与创建民国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邀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并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告。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后，禁锢言论、出版自由，因而1913年初，张季鸾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袁世凯指使党羽暗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后，先生即在北京《民立报》上，为“宋案”慷慨执言，痛斥袁世凯反革命野蛮罪行。不久，又在上海《民立报》揭露袁世凯为镇压革命党人筹措军费，与英、法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在全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因此，袁世凯对先生恨之入骨，查封北京《民立报》，将先生囚禁于军政执法处监狱达3个月之久，几遭不测。出狱后，在上海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上海中国公学教授。1915年，又创办《民信日报》，出任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成在绝望里死去，先生再度来到北京，主持北京《中华新报》笔政。1918年9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方面举办满蒙四路和顺徐二路大借款协定，再陷铁窗，《中华新报》也遭封闭。出狱后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先生以非凡的胆略、勇气和见识，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功绩，称列宁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列宁是“千古一人而已”。其间先生为国民革命策划奔走，无条件地支持和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先生积极参与策划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发动的“北京政变”，推翻了臭名远扬的曹锟、吴佩孚贿选政府。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张季鸾同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任总编辑，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为办报秘诀，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较客观地反映了公众的呼声。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不顾国民党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引起极大震动。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又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实况，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了解。1937年4月，《大公报》还披露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激励了民族斗志。抗战时期，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也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九一八”事变前，先生即公

开点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事变后坚信对日无和平可求，必须持久抗战。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爱国七君子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被捕，先生几度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周旋营救。

“七七”事变后，先生撰写了大量社评文章，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反对溥仪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等汉奸组织的“民族灭亡”政策，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他提出，“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永不至衰落”。更为可贵的是，“八一三”后，先生断然拒绝日本帝国主义检查新闻稿件的非法通告，自动宣告上海《大公报》停刊，表现了中国人的高尚气节。1938年7月，包括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代表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先生受委托起草了著名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大会宣言》。先生执鞭《大公报》15年，在社会动荡中艰难经营，“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终于使《大公报》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并于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全世界最优外国报纸荣誉奖章，成为中国报业的骄傲。张季鸾先生生活俭朴，助人为乐，“以最高兴趣和最低享受”立言报国，积劳成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逝，时年54岁。噩耗传出，国内外一时函电纷驰，同声哀悼，国共两党给以高度评价，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临吊奠，重庆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赞扬先生对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9月26日，国民政府发表褒扬令，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渝主办有各界代

表参加的公祭。先生逝世周年忌辰，全国新闻界、陕西各界在西安城南竹林寺墓地举行公葬，陕北各界竖碑于榆林城内莲花池畔，以为永志（碑座正面有邓宝珊题“健笔卫国”四字）。先生生平著述甚丰，撰写文章3000余篇，由胡政之搜集选编为《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忠于所事，不屈不挠。30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录周恩来、邓颖超挽联），“大公无私、允为论坛之领袖，仰不愧、俯不怍、典范长存；生为英、死为灵、精神永在”（郭沫若唁电）。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象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张季鸾先生也不是无可指摘的，但纵观他的一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其主流是爱国的进步的。我们今天纪念张季鸾先生，将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司马光缘何推荐刘器之

司马光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出任宰相时，推荐刘器之任职时说：“你知道我推荐你的缘故吗？”刘器之回答道：“因为我跟你有旧交。”司马光说：“不是的，我未做官时，你每逢四时八节常来问候，从不间断，自我出任宰相后，却只有你没有来过信，这就是我推荐你的缘故啊。”

（据《中华掌故类编》）

张季鸾先生的新闻事业观

张士基

今年是先父张季鸾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他的一生与中华民族觉醒奋起，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富强，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相联。历经推翻满清帝制、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帝侵华全民抗战的各个历史时期。在这中国人民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张季鸾先生以文章报国为宗旨，新闻事业为阵地，服务于报业达三十余年，毕生尽瘁，其志不渝。值此纪念为国为民贡献终身的季鸾先生之际，谨就他对新闻事业的思想论点，以浅见简介。

张季鸾先生于1905年东渡留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感召，加入在东京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得时代熏陶，培育了言论思想基础。1908年2月在日参加编辑革命刊物“夏声”，宣传革命，开始步入新闻事业。1911年毅然回国，参加推翻满清帝制，同于右任先生编辑上海民立报，嗣后，随革命曲折发展，辗转京沪两地主编北京民立报，民信日报，大共和日报及中华新报等。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张氏以言论针砭时局，英勇斗争，经长期实践，张氏对新闻事业的观点，逐渐发展成熟，为发展我国新闻学和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

1926年张氏与好友胡政之先生，吴鼎昌先生创办新记公司大公报，当时天津尚处反动军阀统治下，9月1日大公报

创刊之日，昭告国人，办报四项方针原则，宣告：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张氏并认为提倡办报“四不”原则，是当时环境下，办报同人自守自励之最小限。“四不”在天津时代，深受广大民众支持，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大公报的独立言论，迅成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纸发展成为我国的舆论重镇，其言论常被国际报章转载，每逢社庆当局各国政府政要名流，纷致祝贺函电，满受重视。大公报的成功，风行一时，领先传媒和“四不”办报原则的实践是不可分割的。

张氏明确主张，办报要维护民众的利益，为国家民族服务。曾言“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注一）基于此张氏的言论总是满腔热诚，感情真挚，以浩然正气道出民众之心声疾苦。他一生写过约三千篇文章，其中大部为政论，“以他浩然的正气，横溢的才华，发而为文，纵论时事，无不鞭辟入理，铿锵有声，既为政府的诤友，也是民众的尊师，更是政府与民间的桥梁，民族之

声的发言人，同时建立了文章救国，舆论报国的风范”。

(注二)

张氏屡论廉政肃贪，敢于严肃批评腐败，推动革新时政。在《论造成廉洁有能之政府》文中言，“大抵政权所在，腐化随之，穷苦革命党，一旦在朝，逢迎阿谀者满左右，生活起居，顿时改常，而黄浦繁华，咫尺在望，久经濡染，则觉现代式享乐生涯，毕竟优于奔走革命时代之寒酸，习惯既成，逐流连而忘返，然以现在之生活程度，薪俸所入，岂足周旋，诱惑之来，复无孔不入。于是不廉不洁者为常行，而廉洁者反成异事矣，政界大势，不其然哉。是以欲造成廉洁政府之第一前提，应由政府诸当局提倡简易生活，以身作范，以新风气感化政界全体，使官吏感觉骄奢为可耻，猷有不足，则以法律绳之”。(注三)在《官吏不得经商投机》文中言，“官吏经商，固属寻常，投机买卖，尤堪骇异。大抵投机市场之枢纽，大半实操诸官吏之手，诚以市场受政局支配，而军事财政机密之观察，则非商人所能，故商人从事其间者，实惟官吏之马首是瞻，市场涨落之背后，往往有官吏为之操纵焉，此等情形，乃报纸之所不载，公文书中之所不见，然事实俨然，通国周知，持以清义无从伸，敢怒而不敢言耳”。(注四)张氏的肺腑之言，义正词严，贪官污吏天良未泯者。细读这些文章，能不深省，警觉检讨自己？今天读来，也还感到有教育意义。

张氏在民族危难，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时期，痛切陈词，“十年来因我方官民之颟顸无备，外患侵入，固早如点滴漏浸，愈久愈深。此中利害关系，吾人數年来亦曾屡有指迷，惜乎国人恒习，事发则慷慨激昂，事过则泄沓怠